

编者按:我市著名作家航鹰女士应本刊之约,新近完成了散文新作《昔日的声响》。这篇经过反复酝酿完成的作品,思路奇妙,想法新颖,写作起来颇具难度,许多老年亲友听了这个构思,都热情地为作家提供素材和细节,使得这篇文章的“声响”更加丰富,充满了亲切、怀念和韵味。

《昔日的声响》由若干个小标题组成,从丰厚的内容中,我们深切感受到作家的乡土情怀和责任感,不论是市井的嘈杂之声,还是大自然的鸟鸣,都是一座城市难忘的记忆,记录了民间生活的烟火味,为我们留下时代的印记与过往城居生态的真实声响。本刊将以连续三期的篇幅,刊登这篇近两万字的文章,敬请关注。

听觉,似乎比视觉对人更具冲击力、吸引力、影响力。人可以管住自己的眼睛不去看一些场面,却很难抑制耳朵不去聆听外界的声音。人生各个阶段会听到不同的声响,特别是年少时的声响,早已“存盘”于人的记忆深处。

一座城市的记忆,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过往的不同时代的声响。那些独特的声响,不应该随着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老去而消逝。可惜那时没有录音机,当今的年轻人无法聆听昔日韵律的“回放”。

文字是个无声的“哑巴”,我却选了这一难以实现的尝试,让文字去追寻那些远逝之声,记录昔日天津城市的声响,但愿不是徒劳。

叮当车

我询问了好几位老亲老友:你们记忆中,最难忘的老天津的声响是什么?他们异口同声回答:有轨电车啊!

是啊,有轨电车曾经是“老城交响乐”的最强音。

1962年,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两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,来天津来艺实习。一天晚上,我陪他们去逛劝业场,见识过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他们,竟然对天津的繁华大吃一惊。站在交通饭店路口望去,滨江道、和平路周围都是挤插插的高楼,从一排排楼顶“冲”下来的霓虹灯“瀑布”,让人觉得是游弋在五光十色的光海的海底。游人如织,商店栉比,尤其是一辆接着一辆慢慢悠悠叮叮咣咣“散步”的有轨电车,更是增添了街市的热闹。挂着红牌、绿牌、蓝牌、黄牌……的电车,各自朝着百货大楼老城厢、墙子河西开教堂、渤海大楼中心公园、解放桥小树林驶去。奇妙的还是开往四面八方的各路电车,全都要在劝业场正门前拐弯儿,转弯来一趟接着一趟,让你的眼睛产生错觉,以为自己是骑在游乐场的转马上。说电车“散步”,是因为它开得很慢,行人穿过马路它会停车礼让,简直是一个让行人的绅士。为了方便快捷,当然也是为了增加客流量,电车的站头儿很多,例如从渤海大楼沿和平路至东南角不长的一段路,就设了国民饭店、劝业场、四面钟、百货大楼、人民剧场等车站,走走停停不慌不忙,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公共交通呀!而且车票很便宜,只需交两三分钱就可以坐到终点站。

香港人比天津人聪明,至今保留了有轨电车,他们形象地称其为“叮当”车。乘坐叮当车观光香港,整条很长的线路只花两元港币,是最便宜的旅游选项。叮当车分为两层,上层还有供游客拍摄的露台,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举着摄像机、照相机抢拍市容街景。

说了半天有轨电车的好处,还没提到它最可爱的特点,那就是“叮叮当、叮叮当”的歌唱了。不知道应该管电车的“响器”称作什么,既不是汽笛,也不是铃铛,像是两块金属板撞击出来的声音。早在1906年,天津第一个实现了有轨电车环绕全城,并通往火车站的公共交通体系,是比利时的成功投资。不知比利时人用了什么金属,制作了撞击声音最好听的“响板”,响亮而不刺耳,清脆而不尖利,绝不像汽车喇叭那样惹人烦躁。而且,它优美的音色穿透力极强,所到之处能够压过闹市各种噪音,独占“领空”。

更有趣的是,“叮当”声不是手按的,是司机用脚踏出来的。电车司机站立着开车,脚下一踩就叮当作响。年轻的司机能踩出各种节奏的花点儿来,跟踢踢踏踏似的。电车首尾两端都有驾驶室,到达终点站后无须掉头,司机只要走到另一端就能往回开了。调皮的男孩子们做

准这个机会,上了车就往后跑,前头的司机只要一踩“叮当”,他们趁机去踩后端的“叮当”,美得耍命!试想,一辆铁轮轧铁轨咣咣作响的电车,前后两端竟一齐叮叮当当,那该是多么好玩儿的动静!

叮当车上不仅有叮当,还有不断吹响的哨声——每到站头儿,当乘客上了车可以关闭车门时,坐在门口的售票员,就会拿起挂在胸前的哨子吹一声,那是通知司机可以开车了。女售票员吹的哨声,不像体育老师吹的哨声那样尖利,是一种温厚的中音,不会刺激乘客的耳膜。叮当车上的哨声,在老天津派生出一句歇后语:老太太赶车——别吹!字面之意,是说老太太跑不快,追赶着要上电车,招呼售票员先别吹哨,引申义则是一种讽刺:别吹牛啦!

停驶叮当车可能是不妥的。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拥有“算盘城”老城厢和“白牌电车环城转”,线路哪怕只是延长到和平路劝业场滨江道,那也是一条多么精彩的旅游观光路线啊!如今的和平路可倒好,“金街”变成多年的静街啦!

虫鸣

无论城市还是山乡,无论往昔、当今,还是未来,人类生活中失去鸟语与虫鸣是不可想象的。儿童和大自然的关系,比他们和成年人的社会关系还要和谐,但如今的小宝贝儿们,接触自然界的的机会太多了!例如捉蟋蟀吧,孩子们大概

昔日的声响(上)



没有几个会逮蚱蜢儿的,有的甚至连蚱蜢儿叫都没听到过,而我们小时候过夏天,一大乐趣就是晚上带着小瓶和手电筒,去犄角旮旯捉蚱蜢儿。那时我家住在马场道一条老胡同的老楼里,后院长满了杂草野花,那简直是我的“百草园”呀!蟋蟀分为两种,唱得好看的尾巴分为两叉,称作蚱蜢儿;叫声难听的个儿大,尾巴分成三叉,称作三叉尾巴油葫芦,不招人待见。即使在黑暗中,我们也能够听蟋蟀大合唱中,分辨出来哪是蚱蜢儿,哪是“三腔子”,几乎每天晚上都能满载而归。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儿来的会发声的昆虫,整个夏天都在举办昆虫大合唱。

人类肆意使用农药和杀虫剂,虫鸣几乎消失了,连嗡嗡飞舞的蜜蜂都少得可怜,靠蜂媒传粉的花果也就难以成熟了。

用网子扑蜻蜓、捉蝴蝶,是孩子们又一大乐趣。蝴蝶美丽却是哑巴,但一群群飞舞时,它们翅膀的震动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,尤其是它们飞翔时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,尤其是它们飞翔时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,尤其是它们飞翔时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。

叫声最响,也最难听的是知了。欧洲人管蝉鸣叫做“亚洲的声音”,我去欧洲确实没听到过知了的叫声。阔别多年,如今回想起来,连“蝉儿鸣夏”“蛤蟆炒坑”(文词儿“荷塘蛙声”)都觉得是悦耳的美声了。今年暑期,我住在蓟州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,听到了久违了的蝉鸣。午睡时间它们也聒噪,我却引为天籁,睡着了还打了个香甜。入秋之后忽遇冷空气,知了们一夜之间就消失了,此时我才切实地体会到,什么叫“噤若寒蝉”。

昔日的虫鸣,最吸引孩子们的当数蝈蝈,卖蝈蝈的小贩身后,总是跟着一大群孩子。拳头大的蝈蝈笼子是用细麦秸编的,每个小笼子里装着一只蝈蝈,一段黄瓜或大葱。蝈蝈和蚂蚱、螳螂可能是表亲,模样儿大同小异。蝈蝈个儿大,通身碧绿,振翅发声很好听。小贩挑的扁担两端装满上百个小笼子,颤悠悠悠走起来,让蝈蝈的大合唱响彻街市。孩子们缠着家长买了蝈蝈,小贩挑着巡回演出的歌唱家们走了,胡同里的扇扇窗口传出了“唧唧唧唧”……

说到鸟语虫鸣,天津还曾有个鸟语虫鸣集中的去处——鸟市儿。南市以西每天清晨那里会传出百鸟百虫“青歌赛”“好声音”“选秀赛”,不过那都是笼中鸟、罐中虫。恐遭鸟类保护组织的批评,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鸟语

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,近些年随着林木增多,市区成了喜鹊之城。黑白花色的大喜鹊、灰色中型喜鹊到处筑巢,终日喳喳叫个不停。没完没了地报喜,人们也就见喜不惊了。

欧洲人没有“喜鹊”的概念,更没有“鹊桥”的传说。他们把喜鹊归为鸦类,在他们看来,白嘴鸦、黑颈鸦、乌鸦、白肚鸦(喜鹊)等各种鸦类是一样的。欧洲也有大批鸟儿进城的问题,甚至一些大型鸟类也选择在城市高楼楼顶筑巢,可能在城市洒农药相对少些,又容易找到食物吧!我看过一篇题为《寂静的乡村》的文章,指出因为人们过度使用农药、杀虫剂、化肥,恶化土壤的同时也破坏了鸟类、昆虫的食物链,许多乡村已经听不到鸟语虫鸣蛙声了。

我们不要以为多了一些喜鹊而沾沾自喜,更多的鸟儿消逝了。

先说家燕。昔日,谁家窗台不落燕子呢?燕子如果能在屋檐下做巢,那家人可就高兴坏了,认为是喜事吉祥。那时候,每天傍晚都能看到成群的燕子,合唱着低空飞翔,那是要回家了。它们不想在树上落户,喜欢找一些能够遮风避雨的廊厦

筑巢。这就注定它们是最亲近人类的鸟了,也从来没见过人类伤害燕子。麻雀与燕子同样是小型鸟,人们却不喜欢听麻雀吵闹,独宠燕子。燕子呢喃的音色十分好听,一窝雏鸟出壳,燕爸爸和燕妈妈穿梭般地飞进飞出,轮番喂食小鸟,屋檐底下或廊厦角落,便似举办了燕子家庭音乐会。

那时候的孩子们都会唱:“小燕子,穿花衣,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可惜,家燕不再以天津市区为家已有几十年了……近三四年以来,我都在蓟州度夏,刚去时见到了久违的燕子,无比高兴。那些身穿白衬衣、燕尾服的小绅士们当空起舞,时而箭似的射向天空,时而在窗外转瞬而过。每天清晨,呢喃燕语唤你起床,俗世间一切烦恼都忘记了。

城市人有哪些不当行为,断了燕子这小小候鸟的生存条件,使曾经亲近人类的美丽生灵不再光顾,应该好好地想一想……

燕声呢喃毕竟是低吟浅唱,更加勾人心魂、引人遐思的是长空雁叫。老天津卫们,每年自打隆冬腊月就盼着雁南飞,有句老话“七九河开河不开,八九雁来雁难来”。大雁是恪守信用的鸟儿,哪怕春寒料峭,仍然会准时归来。如今的壮年人,他们年少时在市区还能望见天上的雁阵,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,春天自南而来,秋天朝南而去。大雁的叫声非常嘹亮,久久地在空中回旋,春来时它们是在向我们问候,秋去时是在向这座城市告别,它们发出响亮的承诺——明年春天我们还会回来的!

然而,恪守信用的大雁,无论是春来,还是秋去,怎么都不见踪影了呢?直到有一天,我才悟出了个中缘由,那还得从30年前说起。天津电视塔建于1991年,那时我曾登上塔顶旋转餐厅,居高远眺,天津市周边大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那是大大小小的水塘或沼泽,特别是东南方向郊区湿地水域丰沛。当时那还是少得多了,历史上天津不仅“濒临渤海,九河下梢”,还是拥有“七十二沽,九十九淀”的北方泽国啊!

事后我才知道,那次登上塔顶俯瞰水乡还是幸运的。多年后,友人相邀再次登上电视塔顶眺望,城市的四面八方变成钢筋混凝土高楼挤成的“灰色森林”,随之而来的是年年的酷热与干旱。大家都受不了了,更甭提大雁、小燕子了,候鸟还来你这里干啥?失去了水域沼泽湿地,也就失去了候鸟迁徙途中休养生息的条件,孩子们再也甭想在市区就能仰望雁阵,聆听长空雁叫了!

昔日城市的鸟语还有鸽子。鸽子是家养的,咕咕噜的叫声也不好听。早年我家楼下半窗子住着一家邻居,他在小院搭了鸽子笼,就在我书房兼客厅阳面窗子的外面,书桌设在窗前。那些年是写作的高峰期,许多作品都是伴着鸽子的吵闹声写成的。那时候的人老实,特讲睦邻,不懂得投诉啥的。有一次闹出了大笑话,当年在河北廊坊师大学校长的作家汤吉夫来津,在我家客厅住了一宿。我们夫妇的卧室在三楼,怕他旅途疲劳,我们早早上楼休息了。第二天早晨问他睡得可好,他说:“几乎一夜未眠,你们打呼噜的声音太吵了。”我们听了非常惊讶,因为我们睡觉并不打呼噜,后来我才想起忘了告诉他后院养有鸽子。

鸽子在笼舍里不停地“咕咕噜”确实烦人,但鸽群只要飞翔起来,振翅摇翎的声响可太有气势了。尤其是某些鸽子脚环上挂有鸽哨,那种哨音美妙极了,发明鸽哨的人太聪明了,竟想到邀请风来吹哨子!特别是高空的风和鸽群在空中回旋时卷起的气流,咕咕响彻云天。在人们头顶上呼啸而过,那种忽东忽西忽上忽下的冲击力,那种透彻肺腑的音色,绝非人力所能及,此声只应天上有啊!

现代城市病之一是人类的异化,疯了似的盖楼。人没长翅膀,却把自己变成鸽子,关进了摩天笼子里。

水声

或许因为胎儿在娘肚子里是“水生动物”吧,人类都喜欢听水的声音,除了洪水,海啸令人恐惧,人们爱听各种水声:小溪、江河、瀑布、雨声、泉水、海涛……对于城市人来说,连自来水的哗哗声都很悦耳。然而,昔日城市的许多水声永远地消逝了……

那时候没有几家能住上单元房,大多数人都住在筒子楼、工人新村连排平房或大杂院里,厨卫水电都是公用的,于是,水声也就随处响在耳畔了。一般筒子楼没有厨房,家家在门外走廊点煤球炉子,烟熏火燎,后来改善了用上液化石油气罐,如今回想一下其实也很危险。每层楼里设一间水房,供大伙洗澡、洗衣服。家家又因没有独立卫生间、淋浴间,女人们都在水房洗头,男人们喜欢光膀子洗上身。所以,水房里几乎终日欢声笑语,自来水龙头哗哗地水流不断,犹如山谷响鸣。

大杂院里就更甚了,唯一的水龙头跟前成了社交场所,“八卦”乐园,和人们的嘴巴一样,水管子几乎关不上。工人新村几幢横排为一方阵,方阵之间竖为甬道,水龙头设在道口,也是终日演奏着水的乐章。每家得有水缸存水,住户还得去道口挑水。到了冬天,水龙头下面的水池子和周围地面都结了冰,可人们还得天天用水,那冰坡就越冻越高,打水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摔跟头。那里成了孩子们在冰上打出溜儿的场所,一个个冻得手通红、脸蛋儿皱出鱼丝儿也不在乎。

我在天津人艺工作时,人艺漂亮的大院还未变成闷煞人的商品楼房。大院门口有个压把儿水井,只要往井口倒一点儿水,你再用去压那个铁把儿,地下水就会汩汩地冒出来,金属撞击声加上水音乐,那真叫“赏心悦耳”。剧院里有几位女演员特爱干净,她们一有空就相约洗衣服,围着压把儿井坐着小板凳儿抱着大铝盆搓着木搓板,溅起阵阵水花儿。金属撞击声加上汩汩水音乐再加上美女,那就既赏心悦耳又赏心悦目了。

现代人越来越懒了,连内衣都不动手洗了。我至今仍然喜欢木搓板,站在手盆前

挚爱,因人而异,每个人都因不同的人生而有所不同。有的人喜欢音乐、美术和文学,还有人酷爱赛车和运动,而我的挚爱,却是一台电子管的黑白电视机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社会生活基本恢复了稳定,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,更多的是如何“促生产”,“精神生活红火,物质供应也逐渐丰富起来。电影《青松岭》里的孙福与钱广的段子、电匣子里的小说《金光大道》中秦富与刘祥的纠葛,在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的同时,发家致富与勤劳致富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梦想。

我家就是这千千万万家庭中的一个。随着社会形势趋向好转,我家的家境也好了起来。母亲以家庭妇女身份,入职工厂并转为国营职工。1969年上山下乡的大哥,也从河北省河间县乡下选调进城,开始拿工资。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,父亲开始有点飘飘然。这天,父亲拉回来一个大家伙,是一台北京牌电子管黑白电视机,别看它个头大,屏幕却只有14英寸,电视盒子里有好多电子管,开机后闪烁不停。开关键用手拧,只能看几个电视频道。

这台电视机,不仅改善了家庭气氛,对我的人生也产生深刻影响,或者说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我从这台电视,看到了阿波罗登月的实况画面,知道了神奇的太空。小时候,天空还是格外晴朗,既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,也有九天银河的夜晚。尤其是夏天的夜空,人们常常在空地儿乘凉,眺望皓月当空,数着满天繁星,听大人们讲故事,更多的是天狗吞月亮的神话,是火星和火星人的传说。望着浩瀚无垠的天穹,有时真担心会掉到天空中,回不了家。而此刻看着宇航员飘飘地在月亮上跳来跳去,感到特别好玩,我也想飞,也想学嫦娥奔月,也想学吴刚去闯闯桂花酒的飘香。

这台电视机让我知道了遥远的拉丁美洲,有个阿根廷,有个布宜诺斯艾利斯。特别是克鲁伊夫更是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,尽管我不是足球迷,但是克鲁伊夫让我知道了荷兰、阿姆斯特丹,还知道了海牙。

小学时,我钟情于跳绳锻炼,特别是高中阶段,我每天坚持步行十多公里,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。从天津西北角居民区出发,经过历史悠久的天津西站,穿过支撑津浦铁路、别具一格的“早桥”,跨过横卧于市河上的“大红桥”铁桥,趟过天津方言岛中的“西于庄调儿方言岛”,才能到达我的高中母校天津五中。我不仅领略了市井人情,也锻炼了身体。尽管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,但克鲁伊夫的身影时不时地在我脑海中闪过,那个盘带过人、勇往直前的形象,一直激励我前进。

我从这台电视机,还开启了独闯社会的历程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,能生产塑料制品的工厂是非常罕见的。我家隔壁有一家小集体性质的塑料厂,在用热合机生产塑料制品时,会产生电磁高频,那时的电视机质量一般,热合机一工作,家里的电视画面就出现一道白线。为此,我大胆地给天津电视台写信,求助解决方法。这件事的意外收获,就是我成了电视台的特约观众。每周,电视台都给我寄来油印的一周电视节目单。逢年过节,还邀请我参加联欢会。有一年,还发请柬邀请我去人民礼堂参加联欢会。当时我一个13岁的小孩子,那个兴奋劲就别提了。

洗内衣。贴身内衣必须是纯棉的,打上肥皂搓洗干净费不了多大劲,连我这个老牌心脏病人都能做到,年轻人却把什么衣服都扔进洗衣机。“滚”出来的衣服洗不干净不说,发硬、褪色,还浪费大量的水。

奇怪的是,如今住进高楼的人们用水方便了,用水量大了,市区、室外却很少听到水声了。密闭的门窗隔绝了邻居,淋浴的“花洒”属于隐私。只有洗衣机发出的噪音震撼楼板,尤其“甩干”时的突突声,住在下一层的住户天花板上,就跟碾过拖拉机似的。

雨雪越来越少的北方大城,显得愈加干旱了。

铃声

当年,如果你家居于市中心,又有临街的窗户,特别是面临十字路口的窗户,每天早晨就睡不着闹钟叫醒。那年头汽车不多,不会吵到你,那是阵阵铃声催你起床。起初,铃声自远而近清脆悦耳犹如山间小溪,令人想起于淑珍唱的《泉水叮咚》那首歌。后来,街上的铃声汇成了川流不息的大合唱,令人疑是银河下九天了。上班的高峰时间一过,铃声又变成“泉水叮咚、泉水叮咚、泉水叮咚响……”

天津曾是全球第一大自行车城。听说如今中国人也成了“(汽车)车轮上的民族”。

我们年轻那会儿是“(自行车)车鞍子上的民族”,当得也美不滋滋的,不觉得寒酸。那时若有“格色”的人说,愿意是拥有一辆小汽车,人们一定会怀疑他不是妄想型患者。

汽车噪音少的区街很安静,尤其是昔日的五大道,只有马场道和成都道,各有一条公共汽车线路。我家住在重庆道,那时候孩子们在马路边玩耍,打羽毛球,跳房子,跳猴皮筋儿……家长们从来不用担心。偶有汽车驶来,打老远就能听到车轮轧路面的沙沙声,孩子们蹦上完全来得及。

什么事一传到中国好像就变味儿。如今,小汽车甚至汽车品牌成了人们相互攀比的祸水,

吃过午饭,我就走出家门。可是,到了马路上我就蒙圈了。我先到建国道,发现这里只有民主剧场,不知又问了多少人,才指给我建设路怎么走,直到傍晚时分才找到建设路上的人民礼堂(科学会堂)。再次进入这样的场所,已是数年后,在大学的阶梯教室里上课的事了。

电视带给我的还远不止这些!上世纪70年代,国家举办了“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”等一系列活动,成立了世界羽联等组织,涉外活动多了,学习外语就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,能会一句斯瓦希里语的“哈哈利利”,是一件很时髦的事。那时,电台开始广播英语讲座,可是看着小册子学英语真是太慢了。这时,电视的优势就显露出来,电视台也不失时机地开播了电视讲座。我有幸成为第一批电视学员。

挚爱

姚庆全



这是由北京外国语学院陈琳讲师主持的《电视英语讲座》,晚上6点多开始。电视里有陈琳老师,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,他们三个人问答互动。而我就是电视机前千千万万个学生中的一个。陈琳老师教会了我全部48个英语音标,还有各种语法、短语、词组。那两个学生,帮我提了我想要问的各种疑问。这样的画面令我记忆犹新。不久前,在电视里看到已是98岁高龄的陈琳老教授,带领北外的师生合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倍感亲切。

还有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女老师主讲的《初等数学》讲座。这个女老师板书工整、思路清晰、语言亲切,讲课时由浅入深,娓娓道来,把枯燥的数学知识讲得通俗易懂,让我在数学的天空中自由翱翔。通过这个讲座,我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,更多地掌握了学习方法,和学习思路,学会了《综合分析法》和《数学归纳法》,这使我比同龄人得到了更多的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,最后让我数理化“通通”。虽然我忘记了那个女老师的姓名,但是这个留着齐耳短发、穿戴朴素的中年女老师形象,像慈母一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通过收看史丰收老师的《史丰收速算法》电视讲座,我可以用手指熟练、快速地进行4位数与4位数的加减乘除,极大地开发了大脑,让我在分析问题、解答问题时,总能突发奇想,获得不同的思路,进而找到捷径。

四十多年前,在课外辅导材料很少、辅导班基本没有的情况下,我通过买来回来的这台电子管电视机,获得了那么多课堂里得不到、一般人得不到的知识,我能不钟情于这台电视机吗?

我跟着电视学习的时间,基本上是每晚的六点到七点,是每天晚饭前的时间,也是我家比较敏感的时间段。由于我需要学习,全家人都能给我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空间。同时,那时的日本电影周、墨西哥电影周等,还有我国有新电影上映,基本都在电视里同期播放。这样,邻居来我家看电视的人也不少。后来,由于我上大学住校,跟着电视学习也变得不可能了。再后来,这台电子管电视机也就没有了后来。

这台电视机不仅是我的益友,更是我的良师。对我来说,这台北京牌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就是一个“传奇”,它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,让我不再烦恼,开启了美丽的人生旅途。现在的电视机那么新颖独特、功能那么强大、内容那么丰富多彩,但我家四十多年前的那台电视机,却永远是我的挚爱!我也要感谢父亲,他就是改变我人生的那个人,他抱来的这台电视机,从此成了我人生的“挚爱”!

工薪阶层家家户户都要买一辆汽车,甚至两三辆,真的需要吗?上下班高峰驾车得忍受堵车烦恼,肺里长时间吸收“车河”尾气的毒害。节假日带着家人出游?一年中又有几次长途旅行计划?若只是在近处转转,得乘坐多少车次出租车,才能顶得上买车动辄几十万元的花费呀。高楼林立比上百万辆汽车的尾气围堵在了市中心,城市人终年在这样的空气里喘息,而人的肺没有排泄的功能。成年人只好忍了,孩子们那一片片稚嫩的肺叶儿呢……

富国荷兰仍然是自行车王国。我在荷兰又看到了自行车的川流,听到了清脆悦耳的车铃声……

昔日的城市还有许多铃声,人们出门喜欢坐“三轮车”,价钱不贵,窄巷、胡同儿都能拉你到家门口。三轮车一律称作“蹬三轮儿的”,你站在路边喊一声:“三轮车!”就会有一位甚至几位来“抢活儿”。三轮车前面绑着个拙朴雕花的大铜铃,铃铛旁有个弹簧钮儿,车夫一按就叮铃铃响,很好听。有的车夫喜欢热闹,一路上不停地按铃,叮叮当当伴你前行。路上的行人,车辆以为你有急事,还真就纷纷礼让,车夫便可把车蹬得飞快。遇上这样的“行走的音乐家”,我心里便特别高兴。

我的年轮没赶上“骆驼祥子”,没坐过“胶皮(车)”。听老辈人说,早年“拉胶皮的”车上也有个大铃铛,当哪当哪的特别响亮。车夫得双手扶着车把,无法按铃,把铃铛安装在座位跟前由乘客代劳。坐车的负责人负责踩铃,脚下一踩铃铛就响,如果遇上会打节奏的调皮乘客那就热闹啦,踩的点儿车响着呢!有的太太带小孩坐车,孩子更兴奋了,一刻不停地踩铃铛、踩铃铛。大街上来来往往若是汇集这么几辆“胶皮”,那简直就是演奏铜铃进行曲、铜铃协奏曲!

手摇铃,也是昔日的日常声响。我刚上小学时,学校不用电铃,上课、下课都由门房大爷拿着个大铜铃铛,大爷时时打着挂钟尽职尽责。我爱迟到,飞跑进校门喊一声:“大爷,等等——”大爷举起铃铛吓唬我,但还是等我飞奔进楼才摇铃。从教室窗口能够看见门房,只看见大爷出来,未等他摇铃,我们便朝着老师大喊:“下课——”老师还没明白过来,院子里的大爷已经摇着铃铛走过来了。

穷街陋巷每天傍晚都会响起铃铛,家家户户只要听到铃铛声,就提着垃圾出去倒在“运土车”里。收垃圾的车夫有时摇着铃铛喊:“倒脏土——”更多的时候用不着喊,铃声就把人们招呼出来了。

铃铛是平民的“响器”。如今平民还是平民,却失去了铃声。悦耳的铃声,是“电声”永远无法比拟的。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文艺周刊